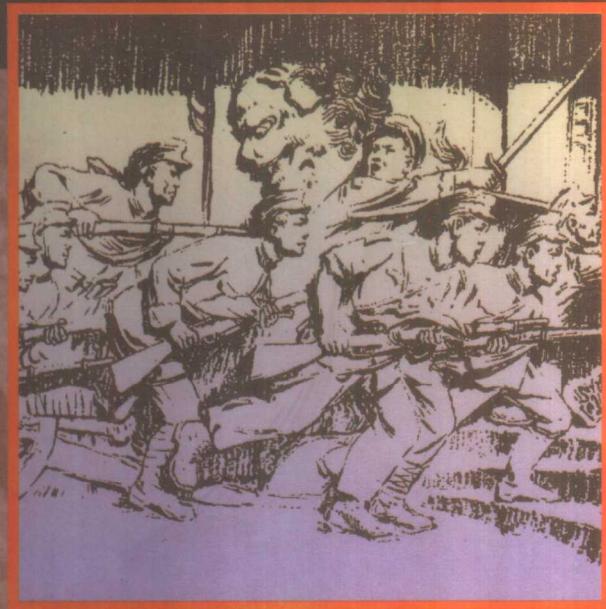


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

1990—1999年辛亥革命论文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

1990—1999年辛亥革命论文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1990~1999 年辛亥革命论文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8

ISBN 7-216-03161-X

I . 辛…

II . 华…

III . 辛亥革命—研究—文集

IV . K25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0836 号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

1990—1999 年辛亥革命论文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编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发行: 邮编: 430022

印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875

字数: 645 千字 插页: 5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46.80 元

书号: ISBN 7-216-03161-X/K·343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章开沅

副 主 编 严昌洪 朱 英

编委 章开沅 严昌洪 朱 英 许小青 郑成林

目 录

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进展

- 1990—1999 年辛亥革命研究述评(代前言) 严昌洪(1)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

- 以“排满”宣传为实例 章开沅(22)
辛亥革命对元典精神的发扬 冯天瑜(35)
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及其历史启示 林家有(50)
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再认识 郭世佑(66)
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近代化——以四川为例 魏瀛涛(86)
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 马 勇(101)

- 同盟会内部风潮与孙中山 李时岳(128)
民初同盟会人的几种社会政治方案 金冲及(142)

- 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 朱 英(167)
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 俞 江(187)
清末立宪派的民权观 刘 伟(207)
清末湖北立宪党人的议政实践 吴剑杰(225)
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 ... 马小泉(243)

- 略论辛亥前后中国社会的分散与整合 罗福惠(261)

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议争	胡绳武(285)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兼论革 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杨天石(303)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	杨立强(322)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军政府	周兴樸(344)
民国初年政治结构和文化初探	张亦工(372)
辛亥革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都督风波 ——李燮和与陈其美争都督辨	饶怀民(386)
晚清绅商阶层与辛亥革命	马 敏(400)
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社会动员	虞和平(428)
孙中山设计的农业近代化模式	苑书义(447)
戊戌辛亥间文化思想与政治	汤志钧(463)
辛亥文化革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龚书铎(481)
辛亥革命时期伦理思想的新课题	张岂之(491)
晚清国粹派的新史学探讨	郑师渠(503)
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	桑 兵(522)
张之洞与湖北报刊	刘望龄(546)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留学生	李喜所(572)
清末民初对封建官本位观念的最初冲击 ——评孙中山的“公仆”观	李文海 赵晓华(585)
孙中山亚洲观论纲	陈锡祺(598)
孙中山与梁启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选择	耿云志(609)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民族形成的进程	姜义华(630)
孙中山心性文明观的民族化特色	段云章(647)
孙中山思想在 21 世纪的地位与作用	张 磊(664)

论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	张海鹏(677)
孙黄交谊与辛亥革命	林增平(700)
黄兴家世及其早年研究	萧致治(710)
矢诚维大局——民初黄兴心态一说	王杰(728)
度尽劫波兄弟在——黄兴与章太炎	唐文权(737)
秋瑾与谢道韫	夏晓虹(757)
张之洞与辛亥武昌首义	
——兼论政治家成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	陈 钧 任 放(773)
张之洞与张謇	冯祖贻(786)
日本决定对孙中山政策诸因素探析	俞辛焞(800)
后 记	(819)

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进展

——1990—1999年辛亥革命研究述评

(代前言)

严昌洪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继1990年选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1980—1989年论文选》以来，辛亥革命研究又走过了10年的历程。这10年中，经历了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和1996年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在两次大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推动下，辛亥革命研究曾掀起了两次不大不小的高潮，出版了若干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发表了一批上水平的论文，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探讨取得了新的进展。

—

前面的10年是拨乱反正的10年，辛亥革命研究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10年的沉寂之后，很快得到复兴。研究者们对极“左”思潮统治下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揭露和清算，他们重新集结队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使辛亥革命研究很快步入正轨，并得到繁荣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研究开创了如下新局面：

第一，辛亥革命研究改变了从前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若干辛亥革命研究人员相对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还培养了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攻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这些史坛新秀已成长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以中南地区学者为主，得到全国各地有关学者支持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全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的成立，更是辛亥革命史学史上的大事，部分省市也相继成立了辛亥革命研究会或孙中山研究会，如湖北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成立了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广东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成立了孙中山基金会。这些学术团体分别联系和团结着一批辛亥革命研究者与热心人，构成新时期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网络。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辛亥革命史丛刊》和内部会刊《辛亥革命研究动态》，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创办的《孙中山研究论丛》等刊物，作为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辛亥革命研究结束了从前“小册子”的时代，各具特色的学术专著陆续出版。若干精品之作，或以内容全面，体例完整见长，或以主线突出，史实详尽取胜，或以史料丰富，论述精当著称，显示了新时期辛亥革命研究的高水平。研究各地辛亥革命的著作不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新的突破，让人耳目一新，从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地方或区域辛亥革命进行系统探讨，弥补了以往辛亥革命史注意全国范围较多，地区性研究比较薄弱的不足。

第三，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开创的每10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讨论会的惯例，在1971年辛亥革命60周年时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后，重又得到恢复，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时，都曾举行过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次会议与

1961年会议相比,不仅规模有所扩大,参加者范围更广泛,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新进展;而且研讨内容有所拓展和深化,显示了辛亥革命研究的魅力和活力。这种逢五、逢十以纪念促进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表示纪念的做法得以推广,仅在1990—1999年间各地举办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就有近20次之多,比较重要的会议有:辛亥革命史研讨会暨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会(1990年,茂名)、湖北省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蒲圻)、广东省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广州)、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长沙)、林增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讨论会(1992年,长沙)、中华民国史青年学者研讨会(1993年,南京)、“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广东)、纪念科学补习所成立九十周年学术座谈会(1994年,武汉)、黄兴学术讨论会(1994年,北京)、纪念兴中会成立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1994年,广州)、振兴中华100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南京)、清末新政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1994年,上海)、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南京)、湖北省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暨辛亥革命85周年学术讨论会(1996年,武汉)、蔡锷逝世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邵阳)、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中山)、“孙中山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上海)、陈英士生平与事业学术研讨会(1999年,湖州)、“孙中山与21世纪中国”学术讨论会(1999年,南京)等。这些会议的举行,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出现一个又一个热潮,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

第四,在新时期开放环境和开放心态下,大陆学者在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使之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一门“显学”的同时,放开眼界,较多地注视到海外史学研究的新进展,翻译介绍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并加强了与海外学术界的交流,

特别是与台湾同行的对话。为了回应海外学术界提出的挑战，大陆学者对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深入研究，甚至借鉴西方的若干史学理论与方法来改进我们的研究，使之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

第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料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大丰收的局面。1981、1986、1991、1996这四个年头的前后，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史料出版的几个高潮。档案资料是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过去利用较少的一种史料，随着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馆藏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续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天津商会档案》等许多珍贵档案资料的公布，为辛亥革命研究者提供了利用第一手资料的方便，甚至提供了澄清有关史实、突破已有结论的可能。《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庚戌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等大型资料汇编和《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南社史长编》等史料长编的出版，使人们减少许多案头翻检之劳，提高了研究的效率。辛亥人物的文集，如《戴季陶集》、《刘揆一集》、《宗仰上人集》等和年谱，特别是年谱长编，如《孙中山年谱长编》等，以及碑传集，如《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以及《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等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是研究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生平、思想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这要感谢出版部门在使这类资料问世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段时间还有不少新史料被发掘出来，如刘揆一家乡的《刘氏十二修族谱》、关于焦达峰、陈作新被杀事件的新史料《文裴致参议院刘彦君书》、《莱阳乱事证实录》、黄兴1911年12月2日在张园筹饷大会上的演说词等的发现，使人们对有关史实获得了新的了解。关于辛亥革命的大型工具书，如，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词典》、张磊主编的《孙中山词典》、章开沅等编著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林增平等编著的《辛亥革命研究备要》等不仅为辛亥革命史的初学者或爱好者提供了入门途径，

而且是对这一学科的全面总结,其价值不可等闲视之。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老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

1990—1999年辛亥革命研究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在上述成就的基础上取得新进展的。这一时期辛亥革命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成果丰硕。据对《辛亥革命研究动态》上所刊载的辛亥革命研究文章目录的统计,1990—1999年每年发表的文章数分别是:1990年455篇,1991年832篇,1992年435篇,1993年322篇,1994年362篇,1995年387篇,1996年372篇,1997年475篇,1998年376篇,1999年401篇。合计数约4400篇。^①这10年所发表的文章不论是总数还是每年平均数,抑或是高潮年份的最高数量都比上个10年有所下降,这恐怕是因为有一部分研究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转向了其他课题,或者在时段上向晚清或民国上下推移,或者在方向上向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早期现代化问题拓展。这种“转向”具有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的意义,诚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加入文化史与近现代化研究的探讨,乃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把较广阔的视野与较连贯的史实,带回到辛亥革命史研究”^②。

然而这一时期学术专著的出版仍然呈上升趋势。一些资深学者进入对学术研究进行总结的阶段,他们将研究论文结集出版,实在是嘉惠学界的好事,因为后学者可以比较容易地拜读学术前辈的成果,并从中获得教益。这类成果有陈锡祺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章开沅的《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及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林增平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湖南出版社

1991 年)、金冲及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李文海的《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张磊的《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等。重要学术会议论文集更是汇集了当时研究的精华之作,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如《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 1994 年)、《辛亥革命新论》(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文集,湖南出版社 1996 年)、《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纪念孙中山诞辰 13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9 年)。这个时期的个人学术专著不仅数量多,而且各有特色,如,《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朱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朱宗震,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辛亥革命与民族问题》(林家有,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沈渭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侯宜杰,人民出版社 1993 年)、《晚清民族主义思潮》(陶绪,人民出版社 1995 年)、《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邱远猷、张希坡,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李燮和与沪宁光复》(饶怀民,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李喜所等,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等等,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种种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新意的见解,显示了辛亥革命研究的新水平。

二、研究面有所扩展。近 10 年来,除了对辛亥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及其社团、重要的革命团体、资产阶级与农民、会党、新军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排满思潮、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预备立宪与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与各地军政府、辛亥时期中外关系、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民国初年政局和“二次革命”、重要辛亥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张謇等)、重要史实和史料的考订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研究并获致新进

展外,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章开沅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已提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构想,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也要注意到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因素,以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他自己以及他所影响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从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魂”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商会与“市民公社”、中国早期现代化等课题入手,深入到当时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其他学者还从人口、自然灾害、游民、土匪、社会风尚等问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作了广泛的探讨,获得许多新的认识。近年来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并由此而局限于革命运动过程的短时段,而是扩展到辛亥时期或这一时期前后的诸多领域,“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转变为“辛亥革命研究”了。

三、若干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化。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社会心理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对辛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革命派及其领袖人物的政治心态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对当时广大民众社会心理、“反满”情绪的剖析,深化了人们对辛亥革命历史局限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一部分学者对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及其原因作了重新审视,有人甚至对辛亥革命“失败说”提出了质疑。对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城市性质、城乡关系、社会力量配置的影响、对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等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以商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团成为 90 年代近现代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有的论著从“国家—社会”这一新的理论视角,着力探讨了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辛亥

革命研究的领域，使辛亥革命研究得以深化。不少学者还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对人物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也有新的成就，如革命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和比较次要一些人物以及革命对立面人物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比以前要细致得多，包括了对转变中的士大夫阶层、留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海外知识分子、女知识分子等的研究；从区域社会的角度研究地方辛亥革命，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等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对民国初年社会政治状况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变，对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国元年前后国民“参政热”、政党政治与民初国会、民国初年的法制改革等都有比较多的研究。

四、对“革命否定论”和“辛亥革命应该避免论”的回应，是这个时期辛亥革命研究中颇有意思的一个插曲。有的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个好事情的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造成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有人将“辛亥革命应该避免”的观点归纳为三点：(1)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它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当初如若避免了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2)辛亥革命式的暴力革命传统，是一种前现代化类型的旧式政治行为模式，它的最大弊害在于，一方面打断了社会阶层的必要发育过程，另一方面则耗费了社会仅有的剩余财富。而这些正是一个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3)由于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建设现代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所以它需要进行高度的社会动员，而高度的动员只有高度的权威才能实现，但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没有创造出新的权威，中国此后的种种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都可归结为“权威危机”。^③针对这些看法，一部分学者发表文章，或指出辛亥革命并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

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辛亥革命是清朝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历史早已为辛亥革命作出了结论，今天的论者即使从学术上重新探讨这个问题，也应从史实出发，而不能简单地发一通感想式的议论。或以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及其对革命的认识为依据，说明和平道路在当时的中国走不通以后，孙中山和其他志士才走上武装革命道路的。^④或以事实说明，民国初年出现的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复辟帝制的结果，是各地大小军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产物，而不能归咎于辛亥革命。^⑤还有一些文章以事实说明，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些论述不仅再次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而且推进了辛亥革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三

收入本书的论文是从 1990—1999 年发表的 4400 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编者的本意是想通过此书反映这一时期辛亥革命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但由于编者学识与眼光的局限，也由于篇幅的限制，可能还有许多好文章未能入选，我们深表遗憾。

收入本书的 45 篇论文大致反映了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一些特点。这些文章按内容可以分为 8 组，其中以辛亥革命运动的具体事件为题材的、反映经济问题的、关于中外关系的文章比较少，而探讨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的、论述清末新政与民初政局的、研究辛亥革命与思想文化变迁的论文相对要多一些。

中国早期现代化一般认为兴起于洋务运动时期。实际上，“直至 20 世纪初，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其他一代新型政治领袖崛起，他们以明确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为指导，以革命手段推翻延续 2000 余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且推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以及文化、习俗诸方面的

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辛亥革命才称得上是中国历史全面走向近代的发端。”^⑥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才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正式开端。在今天人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关注历史上的现代化历程，对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进行探讨，是很自然的事情。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动因何在，有的文章对过去那种阐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冲击—反应”论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这种理论将中国近代化动力全然归之西方冲击，说中国社会本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全无向近代转化的动力，只是由于西方的冲击，中国被动反应，方一步步走出中世纪，是有失偏颇的。文章以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高峰——辛亥革命为例，说明它决非单单由于西方影响所造就，而是内外因素相激相荡的产物。仅以促成辛亥革命爆发的观念性动因而论，便是来自西方的种种学说（如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民族主义、民主共和理念等等）与来自中国传统里富于活力的精神相汇合而成。如果说，西来的近代学说赋予辛亥革命以时代色彩，使其区别于往昔多次演出的改朝换代的“造反”和种种“托古改制”的变革，那么，古老的传统精神则赋予辛亥革命以民族风格，使其与其他国度发生的革命运动大相径庭。而且，“西来”的与“古传”的两种观念，又发生着复杂的交互关系，共同融会为波澜壮阔的“辛亥精神”。^⑦

有的文章试图站在现代化的理念上分析辛亥革命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何以严重背离，认为就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意义必将愈加突出，愈加重要。不过，辛亥革命毕竟来得过于迅猛，它不仅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从而使革命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法稳住局势，恢复和重建秩序，推动中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持续发展，反而因旧辙已坏，新轨未立而陷入空前的混乱；而且，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